

# 中南美洲反共情勢之檢討與展望

王建勛

## 一 中南美洲軍人反共任務之加強

自一九五九年一月，古巴赤化以後，國際共黨即擴大對中南美洲滲透與顛覆，很多國家均處於動亂之中<sup>①</sup>。中南美洲國家的共黨活動，與整個西半球的安全，息息相關，因而引起美國的憂慮。美國很早就希望在「美洲國家相互援助條約」(Inter-American Treaty of Reciprocal Assistance)基礎上，把中南美洲的安全，納入北美防衛體系，并敦促中南美洲國家在「美洲國家組織」之下，建立一支「泛美常備軍」，以便隨時打擊中南美洲任何地區的共黨動亂。但是很多中南美洲國家，唯恐對美國軍事關係的加強，會導致國家主權的削減，容易引起大國干預小國的內政，故對美國的上項主張，未予採納。同時美國鑑於古巴赤化的教訓，對每一個中南美洲國家的共黨動亂，亦祇採取個別的方法，相機應付。從一九六〇年至七〇年，美國曾以十億美元用於對抗共黨顛覆，但事實上，中南美洲的共黨顛覆危機，迄今尚未完全消除。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為防止中南美洲出現第二個古巴，逐漸的從外部的防衛，轉向中南美洲國家的內部安全<sup>②</sup>。所以美國在理論與政策上都有了新的改變：在理論上，美國認為中南美洲國家在民主政治發展緩慢、無效以及經濟又正落後的情況下，軍人領導國家政治是不可避免的，因而開始修改以往對軍人干預政治的成見；在政策上，美國軍事援助計劃亦開始強調以心理作戰來防止鄉村中的農民參加共黨游擊隊，以加強軍人的教育與訓練，來加強他們維護國家安全與解救經濟與社會危機的責任心。因此，近年來，中南美洲的軍人，除了防制外來的威脅外，亦要担负維護國家內部安全和支持國家經濟與社會建設等多方面的任務。

誠然，在美國政策與理論影響之下，很多中南美洲國家的軍事力量獲致重建。現在中南美洲國家所擁有的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軍隊，已成為壓制共黨動亂的有效力量。這亦是自一九六四年以來，巴西、哥倫比亞、委內瑞拉、祕魯、玻利維亞等國農民革命武裝游擊隊逐漸消退，以及多明尼加、瓜地馬拉、烏拉圭等國共黨城市暴亂受到壓制的重要原因。但在另一方面，由於軍人影響力的增加和地位的提高，亦鼓勵了他們對國家政治的干預。他們往往為了建立一個有效率的政府，以粉碎共黨滲透與顛覆陰謀，而紛

註① Max, Alphonse: "Guerrillas in Latin America" 1971. Hague Interdoc. Pp. 6-80.

註②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卷六期「問題與研究」月刊，拙作：「西半球安全與美國的軍援政策」一文。

紛發動政變。所以自一九六四年巴西軍事政變以來，阿根廷、祕魯、巴拿馬、厄瓜多爾、智利、玻利維亞、宏都拉斯等很多國家，均先後進入軍事統治。即使具有民主傳統的烏拉圭，亦成爲半軍事統治狀態。目前拉丁美洲三億人口中，約有四分之三生活在軍事統治之下。中南美洲國家的軍事政變，似乎已成了不可抗拒的潮流。

## 二 南美洲反共情緒高漲與南大西洋公約的醞釀

中南美洲各國均存在着複雜的問題，如人口膨脹、農業與社會改革緩慢、國民所得分配不均以及生產無法達到預期標準，加以近年來農產品及原料的滯銷，貿易逆差的惡化，以及外債的累增，使這些國家都染上了可怕的通貨膨脹，並成爲共黨煽動羣衆反對資本主義、製造社會騷亂的藉口。此外，中南美洲不斷爆發軍事政變，且爲防制共黨顛覆又不斷擴張軍備，曾引起美國國會的不滿，導致對中南美洲援助的一再削減；而美國資本的擴張，又引起中南美洲各國朝野的反感，從而發生「經濟利益」的紛爭。一九六八年祕魯軍事政府沒收美國石油公司的財產，即爲一例。同時，大多數中南美洲國家，一方面都自認是開發中國家，紛紛加入不結盟國家集團，一方面惑於美國的所謂「和解」政策，爭相改善與共黨國家之關係。這對整個西半球安全而言，「門羅主義」已成歷史陳跡，國際共黨勢力逐漸在拉丁美洲擴張，美洲國家更難以維持一九五〇年代所建立的「相互援助」的理想。在此一情勢發展中，中南美洲的國有化問題、巴拿馬運河問題、以及智利的「社會主義」與阿根廷的「貝隆主義」相互激盪，不僅中南美洲國家已對美國離心，一些反共的軍事政府，亦因保守與激進的對立，內部發生衝突，馴致中南美洲更加動盪不安。

這種情勢，一直到一九七三年九月，智利的阿葉德共產政權被軍事政變推翻，才逐漸穩定下來。一九七五年八月，祕魯瓦拉斯哥（Juan Velasco Alvarado）垮台，以及一九七六年三月阿根廷的「貝隆主義」破產，更使情勢好轉。南美洲一些軍事政府，鑑於共黨破壞活動已形成經常的威脅，多採取嚴厲手段，對內鎮壓共黨活動，對外亟謀聯合反共，以對抗國際共黨的侵略威脅。

(一) 巴西與阿根廷反共活動的加強：長久以來，南美洲兩個最大的國家巴西與阿根廷之間有著很深的芥蒂。阿根廷在對美國的關係上，常認爲巴西是美國的「附庸」，而不願意與巴西合作。且因「貝隆主義」的影響，阿根廷的政治領袖們與工人階級所形成的強大力量，也多少對巴西產生威脅。一九七三年，貝隆東山再起，很多巴西共黨武裝叛亂分子逃往阿根廷，使巴西蓋賽爾（Ernesto Geisel）總統的剿共行動遭遇很大阻礙。如果阿根廷成爲共黨鬥爭基地，則巴西的安全即無法保障。所以當時巴西即極力協助烏拉圭、巴拉圭及玻利維亞的經濟發展，並在安全措施上，加強對該等國家的維護。一直到一九七六年阿根廷的軍事政變，把貝隆夫人（Estela Martinez de Perón）推翻，兩國的關係才開始好轉，兩國也開始以嚴厲的手段，大舉清剿國內的共黨暴徒。

以巴西而言，自能源危機以後，外債已達二百廿億美元，貿易赤字卅五億美元，所以通貨膨脹隨之惡化。雖然巴西爲開拓新的

國際市場，愈來愈趨向第三世界，但是在共黨滲透與顛覆下的社會流血鬥爭和政教衝突，已迫使政府採取更嚴厲的反共措施。在最近幾個月來，在政府軍大規模的剿共行動中，即拘捕了一千多名共黨分子。根據巴西共黨機關報（*Voz Operaria*）透露：自一九七六年初以來，巴西共黨重要頭目（即是年十二月第六屆巴西共黨大會所選出之委員），已有一半被政府軍非殺即捕。

至於阿根廷，自軍事政變以來，經濟與社會的混亂情勢迄無改善。外債已達一百億美元，通貨膨脹率是百分之三百五十，因而勞工受害最大。軍事政府在解決經濟問題上，無法抵抗保守派和大企業者的壓力，勞工薪資不能隨着通貨膨脹而提高，以致勞工愈來愈反對政府。所有政黨已被解散，以前支持軍事政府的人，多已被捕，新聞更被嚴格的管制。由於經濟與社會問題不能解決，亦就無法恢復社會秩序，極左與極右派互相火拼，都市中恐怖份子橫行，鄉村共黨游擊隊復起，社會鬥爭趨於惡化，阿根廷幾乎已處於內戰邊緣。從一九七六年初以來，「貝隆主義」左派暴徒（*Montoneros*）所進行的恐怖暗殺，便使八百五十人在城市暴亂中死亡。其他綁架、搶劫、爆炸事件亦層出不窮。城市暴亂的擴大，已引起軍方憤怒。九月八日，軍事政府曾頒佈「防制社會衝突」法令，依據該法令，所有罷工、示威者均處于六年徒刑。同時，軍方展開大規模剿共行動，曾圍獲九門大砲、六千隻手槍和步槍，並捕獲七名武器製造者，其中多屬外國人。因為阿根廷的左派及共黨動亂日趨惡化，軍事政府已準備採取智利軍方的反共政策，以嚴厲的鎮壓來遏止共黨及左派的暴亂。

（二）智利的嚴厲反共措施與智、阿聯合反共：一九七三年九月，智利經過一次流血政變，把阿萊德政權推翻。軍事政府不僅關閉國會、禁止政黨活動、管制新聞，並且還採取強力的鎮壓手段，搜捕左派、共黨以及反政府分子，因而引起國際間的不良反應。西歐及北歐一些國家拒絕繼續給予智利援助，並對已過期的債款，不同意展期償還。南美洲其他一些國家亦不願意與智利合作，墨西哥與智利斷絕外交關係。西方國家反對智利軍方實行「法西斯主義」，使智利陷於孤立。軍事政變以後，智利經濟更爲惡化，國際市場不振，工業繼續衰退，加以外債的重壓，以及國際援助的減少，致使一九七六年初的通貨膨脹率高達百分之六百，比一九七三年的情況還要危急。一九七六年六月，「美洲國家組織」外長會議在智利首都聖地牙哥召開，包括美國國務卿季辛吉在內的所有美洲國家代表，均呼籲智利軍事政府停止流血與強力鎮壓。從此，智利軍事政府已開始釋放一些政治犯，並努力改善國際關係。

智利經濟情況惡化，需要美國的援助，又須實行資本主義政策，才可挽救經濟危機。但是智利原屬於安第斯經濟組織<sup>③</sup>，該組織所屬會員國如祕魯、哥倫比亞、玻利維亞、厄瓜多爾、委內瑞拉等爲爭取經濟獨立，均嚴格限制外國資本的流入，因而智利的上

③ 南美洲接連於安第斯（*Andes*）山脈的國家，原有祕魯、哥倫比亞、玻利維亞、厄瓜多爾、智利等五國成立「安第斯經濟組織」。該等國家於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在哥倫比亞首都波哥達（*Bogota*）集會，共同聲明開創地區性的經濟合作。一九六八年五月，五國批准此一計劃，一九六九年簽訂「經濟整體化協定」，其主要是爭取「經濟獨立」、「反對外資控制」。

述經濟措施就與這些國家的政策，發生基本衝突。終於在一九七六年八月，智利拒絕簽署一項對外國資本嚴格限制的公約，而退出該組織。

智利退出該組織以後，即積極的爭取阿根廷的合作。今年十一月十三日，阿根廷總統維特拉（Rafael Videla）應邀訪問智利。兩國在公報中，聲明加強經濟、貿易與技術合作，譴責國際共黨直接或間接的顛覆與滲透，呼籲國際組織採取措施，預防和制裁共黨的顛覆與恐怖主義。但是阿根廷的軍事政變是不流血的政變，並且阿根廷對付左派或共黨份子採取的手段，亦不如智利的強烈，所以在聯合反共的行動上，並未達成具體協議。不過智利總統皮諾契特（Pinochet Ugarte）已強調阿根廷與智利都同樣受著國際共黨的威脅，尤其是當前阿根廷共黨暴亂繼續擴大，認為必須採取與智利同樣的方法，才可以免除共黨顛覆危機。所以如果阿根廷共黨暴亂不止，則智、阿兩國採取聯合反共行動，仍大有可能。

(二)「南大西洋公約」的醞釀：雖然南美洲國家鎮壓國內共黨暴亂的方法，強、弱不一，但是他們要預防國際共黨的侵略威脅的目標是完全一致的。最近它們鑑於蘇俄海軍勢力的擴張，蘇俄軍艦在南大西洋的威脅日增，都已提高警惕。因為南大西洋兩岸的國家如巴西、阿根廷、烏拉圭，以及非洲南部的南非聯邦都担心一旦南大西洋的航道被蘇俄海軍切斷，則兩岸國家的航運與安定都將受到影響。因之，它們有意團結起來，形成一個軍事聯盟，以防制蘇俄的擴張。巴西不僅面積最大、人口最多，並且亦是軍事力量最強的國家。一九七六年二月，季辛吉訪問中南美洲六國時，曾促成美、巴雙邊協定的締結，使巴西在南美洲和南大西洋的地位，更為提高，故甚熱衷於籌組一個像「北大西洋公約」一樣的「南大西洋公約」。同年七月至十一月，巴西、阿根廷、烏拉圭、智利、哥倫比亞、祕魯、委內瑞拉、千里達——托巴哥以及美國在拉丁美洲沿海所舉行的聯合海軍演習，似可表示南美洲國家的反共步調，已漸趨一致，軍事合作已逐漸加強，籌組「南約」的可能性亦愈來愈大。

### 三 中南美洲少數民主國家之困擾與反共態度問題

誠如上述，每一個中南美洲國家的共黨動亂，均與其他國家的安全，休戚相關，所以軍事政變就具有一種感染性的作用。一方面是中南美洲國家政黨政治缺乏效率，導致軍人的干預與民主政治的衰退；另一方面當一個國家面臨共黨動亂或經濟危機，而無法自拔時，軍人即成爲維護國家安全的唯一力量。從一九六四年巴西軍事政變，一直到一九七六年三月阿根廷軍事政變，中南美洲還能真正維持民主制度的國家已經不多。中美洲的哥斯達黎加，因爲長久以來不設軍隊、教育普及、兩黨制衡與勵行民主改革，可謂已奠定了穩固的民主政治基礎。其他如哥倫比亞、墨西哥、委內瑞拉以及加勒比海新獨立的一些小國，都因爲程度不同的共黨動亂或社會衝突，其民主政治無不處於困擾而徬徨的境地。這幾個僅存的民主國家的動向，不僅關係著中南美洲民主政治的前途，它們的

反共態度亦會影響到中南美洲整體軍事合作與集體安全的進展。所以現在進一步的把它們所面臨的困擾與反共態度，分別的作一簡要說明：

(一)哥倫比亞：以土地面積與人口而言，哥倫比亞僅次於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仍是中南美洲的大國。一九五八年，自由與保守兩黨結束內戰，即以一個「君子協定」輪流執政。雖然黨爭已告平息，但是由於人口增加、失業與貧窮所引起的社會鬥爭惡化，共黨動亂的情勢並沒有什麼改變。

一九七四年，兩黨輪流執政期限屆滿，在大選中兩黨都曾推出總統候選人。雖然自由黨候選人羅培茲(Alfons Lopez Michelsen)以二百六十萬票對保守黨候選人哥米茲(Alvaro Gomez)的一百四十萬票領先，而當選總統，但兩黨仍繼續緊密合作，在十三人的內閣中，一直保持兩黨的均衡。左派政黨，無論是親俄、親毛共黨，在大選中曾採取聯合陣線，一致支持「勞工聯盟」候選人艾其佛里(Herman Echeverri)競選總統，結果祇獲得百分之二點七的選票。這說明共黨要想以合法鬥爭取得政權，還差得很遠。所以選舉過後，共黨及其他左派又告分裂，主張武裝革命的「哥倫比亞革命力量」(F.A.R.C.)、「卡斯楚主義」的「國家解放軍」(E.L.N.)、親毛的「人民解放軍」(E.P.L.)，又在安第斯山擴張他們的武裝革命基地，並不時的潛入城市製造暴亂。一九七五年，前獨裁者羅哈士(Rojas Pinilla)去世，其所領導的極右派反共力量(A.N.A.P.O.)已迷失了方向，對共黨的壓制，已不如前。一九七五年六月，隨著學生示威與共黨暴亂的擴大，羅培茲總統宣佈全國戒嚴。在戒嚴期間，軍隊維持社會秩序，很多大學被軍隊接管。一九七六年六月，羅培茲總統為避免軍方擴大干預國家政治，宣佈解除戒嚴，但不久又因共黨暴徒綁架、暗殺等恐怖事件層出不窮，而又恢復戒嚴。

一九七六年四月，哥倫比亞舉行地方選舉，曾由九百五十萬選民選出九千位地方官員和四百多位議員。這次選舉是在學生示威、共黨動亂下進行的。所以投票並不踴躍，投票率祇有百分之四十。這可以看到自由與保守兩黨聯合執政已面臨困難。當前哥倫比亞政府，必須依靠軍方支持才可維持政局的穩定，因而哥倫比亞的民主政治亦受到考驗了。

(二)墨西哥：當前墨西哥最嚴重的就是土地集中問題。六年來，墨西哥總統艾其瓦利亞(Luis Echevarria Alvarez)所推行的土地改革政策，一直遭遇阻力，為此，左右兩派的衝突層出不窮。由於土地與社會問題難獲改善，共黨動亂亦跟著無法消除。艾其瓦利亞總統任期到一九七七年一月屆滿，新當選的總統羅貝茲(Lopez Partillo)已聲明要採行激進的政策，實行土地與社會改革，並繼續推動已震撼世界的「國際新經濟秩序」<sup>④</sup>。因之，墨西哥的右派已強烈反對政府可能帶領國家接近共產主義的危險，而

註④ 墨西哥總統艾其瓦利亞企圖成為第三世界在拉丁美洲地區的主角，曾在第三屆「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U.N.C.T.A.D.)上提議國際間應簽訂一項「各國經濟權利和義務憲章」，以限制落後國家繼續受大國的經濟剝削和壓迫。已經由一九七四年十月聯合國大會所通過。并與同年第六屆聯合國大會特別會議所通過的開發中國家所提建立「國際新經濟秩序」宣言及「行動綱領兩項文件，合併成為建立「國際新經濟秩序」的指導原則。

美國與墨西哥有四千公里長的邊界，亦顯得非常敏感。艾其瓦利亞總統一方面指責國內一羣地主與富商企圖反對政府，一方面抗議美國對墨西哥的政治干預，而引起左派工會發動十萬羣衆示威。最近有卅名美國國會議員聯名向福特總統說明當前墨西哥的政治趨向，已對美國構成嚴重威脅。所以現在墨西哥正盛傳亦有爆發軍事政變的可能。

(三)委內瑞拉：委內瑞拉已因石油而暴富，由於雄厚的石油收入，城市中的豪華汽車、高聳雲霄的大廈，都在與日俱增。然而現時委國仍有殘破、污穢的貧民窟，衣食不得溫飽的窮人。人口大量流入城市，農村更爲落後，城市中大量失業已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雖然近年來，委國政府利用共黨內部矛盾，採取一種「剷、撫兼施」政策，企圖使「修正主義」與「武裝革命」共黨擴大分裂，以削弱共黨武裝暴亂的力量，但現時委國所存在的社會衝突，仍潛伏著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四年間共黨擴大暴亂的危機。能源危機以後，委國石油國有化的爭論復熾，共黨及左派政黨藉此攻擊貝瑞斯(Carlos Andrés Pérez)總統是「美帝國主義」的警察，而煽動羣衆反對政府。以往委內瑞拉曾與所有共黨政權斷絕外交關係，反共立場至爲堅定，而今貝瑞斯政府企圖左右逢源，改變政治立場，一則聯合祕魯的民族主義者，推動不包括美國在內的「拉丁美洲經濟整體化」<sup>⑤</sup>，再則打破美洲國家對古巴的封鎖，並進而與蘇俄、古巴、中共建立外交關係。現時委國共黨及左派勢力有增無已，實爲貝瑞斯養癰貽患所致。最近委國首都卡拉加斯有家庭主婦遊行示威，反對政府給予智利左派難民以政治庇護，這亦象徵著右派反共勢力已在興起。

(四)加勒比海地區：古巴的赤化，已使加勒比海的情勢變得複雜。一九六六年，蓋亞那擺脫英國而獨立以後，加勒比海中的英屬島嶼亦多先後宣佈獨立。因爲它們都有著共同的特徵，那就是政治不穩、經濟落後、大規模失業，以及文化交替、宗教與種族等問題，使加勒比海地區更爲動盪不安。尤其是它們都是從長久殖民統治中獨立，唯恐重踏歷史覆轍，而對美國心存戒懼，它們的政治動向已非常危險。

一九七三年五月，加勒比海的巴貝多、蓋亞那、牙買加以及千里達——托巴哥等四個國家，成立加勒比海共同體，而後，又有格林納達(Grenada)、安提瓜(Antigua)、蒙特塞拉特(Montserrat)、聖其次(St. Kitts)、尼維斯(Nevis)、安圭拉(Anguilla)、聖盧西亞(St. Lucia)及聖文森特(St. Vincent)等相繼參加。這些成員，爲了擺脫殖民主義，爭取經濟獨立，要在政治、經濟以及外交等廣泛的領域內進行互助合作。國際共黨認爲這是第三世界反對殖民主義的新生力量，而以經濟或政治滲透，展開爭奪。一九七五年七月，「美洲國家組織」已通過各會員國，可隨意恢復與古巴的經濟與外交關係，迄今牙買加、蓋亞那、千里達——托巴哥、巴貝多、巴哈馬均已與古巴建交。古巴自認是加勒比海國家，已積極在該地區扮演一個活躍的角色，所以隨著加勒比海地區新國家的誕生，古巴的勢力範圍亦逐漸擴大。

註⑤ 世界能源危機以後，中南美洲非產油國家支付赤字在一九七四年已達八十億美元。爲挽救國家經濟困難，各國均有意在集體行動上突破所有難關。非產油國尤賴產油國的援助，已由石油暴富的委內瑞拉就以經濟援助爲條件，積極推動「中南美洲經濟整體化」。

最嚴重的是牙買加。因為經濟情況不佳，工人鬥爭惡化以及貧富懸殊所形成的社會衝突，使牙買加愈來愈傾向古巴，并企圖仿照古巴的「社會主義」，以謀社會問題的解決。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左傾的牙買加總理曼雷（Michael Manley），在國會選舉中，獲得壓倒性勝利，他將繼續執政五年。所以今後牙買加的動向使人憂慮。

位於南美洲東北海岸的蓋亞那，亦因為經濟不景、嚴重失業以及委內瑞拉與蘇利南（Surinam）邊界爭執的威脅，而求助於共黨國家，逐漸傾向「社會主義」。一九七五年三月，蓋亞那總理柏爾南（Forbes Burnham）訪問北平的時候，曾譴責「霸權主義」，聲明支持加勒比海地區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一九七六年十月，柏爾南攻擊美國，認為千里達駐蓋亞那使館爆炸事件和古巴客機撞毀事件，都是美國同謀。柏爾南的態度愈來愈為偏激。

其他如已成爲美國在加勒比海地區海空防衛基地的波多黎各（Puerto Rico），自一九七二年九月街頭暴亂以後，亦已受到古巴和中共的積極煽動而欲排除美國的勢力，進行獨立。如果美國被迫撤除在波多黎各的軍事基地，加勒比海地區的安全，勢必更爲可慮。

上述幾個民主國家所面臨的各種困擾，直接或間接的都影響著它們與美國的關係。近年來，委內瑞拉與墨西哥爲領導中南美洲國家建立經濟整體化，已促進中南美洲國家爲爭取經濟獨立，減少對美國的依賴，并紛紛轉向歐洲尋找新的市場與新的援助，加強與歐洲國家合作。自智利軍事政變以後，歐洲反應非常激烈，尤其是西歐和北歐國家，已對中南美洲「軍國主義」思想與它們所謂的「法西斯主義」蔓延，表示特別關切。西歐及北歐國家曾經執政或尚未執政的一些民主——社會主義政治領袖們，就企圖在中南美洲推行民主——社會主義國際運動，來維護中南美洲的民主政治的發展。一九七六年五月，在委內瑞拉首都卡拉加斯舉行的「歐洲與中南美洲民主——社會主義」會議，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

參加這次會議的有西德的布蘭德（Willy Brandt）、奧地利的柯典斯基（Bruno Kreisky）、法國的羅卡德（Michel Rocard）、葡萄牙的薩瑞斯（Mario Soares）、西班牙的干薩里斯（Felipe Gonzales），以及英國、比利時、丹麥、瑞士、挪威、芬蘭等十七個國家的社會黨領袖。中南美洲方面有廿一個國家的民主——社會主義黨領導人物。會議中主要討論兩個議題，其一是從對社會主義的展望中，檢討中南美洲與美國的關係，以及中南美洲的軍事統治與民主政治的關係。對美國關係方面，中南美洲的代表們還不希望作急劇的改變，他們仍要在一個平等的基礎上繼續與美國談判；對於中南美洲不斷的軍事政變，他們認為這是起因於一九六〇年代古巴「革命輸出」所加諸於中南美洲國家對安全的憂慮，所以他們主張祇有增加歐洲與拉丁美洲的合作，始可遏阻「法西斯主義」的蔓延。其二是討論如何加強歐洲與中南美洲民主——社會主義的合作。最後他們在聯合公報中聲明，歐洲國家關切中南美洲的政治發展，贊同中南美洲國家爲獲得生產原料合理價格所進行的鬥爭，並支持中南美洲國家爲達成資源、資本、技術問題的解決，以及拒絕外國和多國性企業之政治干預，而走向國際新經濟秩序之建立。

從以上的分析，可見中南美洲僅存的少數民主國家，雖然反共原則未變，但在解決本身各種困難所使用的方法和路線，已經是愈來愈為分歧。

#### 四 中南美洲反共情勢的展望

近年來，南美洲大多數國家已從實際體驗中，深切了解共黨顛覆的危險，而亟謀採取聯合行動。巴西、智利、阿根廷、巴拉圭、烏拉圭等都是絕對反對共產主義的，所以容易在廣泛的合作基礎上，加強反共措施。然而，這些國家雖已普遍的壓制了共產主義，但其現實主義的經濟與外交政策所引起的「對內反共、對外聯共」的矛盾，仍是遏阻國際共黨滲透，達成西半球集體安全的最大障礙。又因他們經濟與外交政策的分歧，對於外來的威脅以及彼此在邊界上的安全顧慮，亦無法消除。安第斯山脈的祕魯、玻利維亞及厄瓜多爾等國所存在的反智利情緒，即是由此而來。

巴西的邊界，除了厄瓜多爾和智利以外，接連着所有南美洲國家，如果其中任何一國，變成共黨武裝鬥爭基地，都會給巴西帶來威脅，所以巴西一直主張建立一個地區性的防衛組織。可是南美洲其他國家，由於久懸未決的邊界糾紛，都在擴張軍備，互不信任。祕魯引進了蘇俄的武器，智利唯恐祕魯有意奪回「太平洋戰爭」(1979—1983)所失去的領土，而感到焦慮。最近祕魯照會智利，表示支持玻利維亞出海口的要求，而使情勢更為緊張。此外，已控制了烏拉圭政權的軍方，唯恐委內瑞拉干預內政，而對委國使館人員嚴加防範，結果引起委國的不滿與兩國外交關係的斷絕。這些邊界糾紛與政治衝突，不僅使西半球一體化的理想，無法實現，而且可能為國際共黨所利用，成為嚴重的危機。

就整個中南美洲的反共情勢而言，具有地理與政治重要地位的阿根廷軍事政變，以及蘇俄支持古巴出兵安哥拉，對於中南美洲的反共前途都具有重大影響；前者使南美洲的反共情勢暫時趨於穩固，後者使中南美洲國家恢復對古巴侵略的恐懼，減少對國際共黨姑息的念頭。當季辛吉於一九七六年二月間訪問中南美洲六國時，中南美洲國家普遍認為古巴在安哥拉的侵略獲逞，可能鼓勵其對中南美洲冒險，而感到憂慮。美國總統福特和季辛吉都曾提出警告，美國將不容許蘇俄和古巴在安哥拉以外，再有新的冒險，並堅決表示美國維持西半球安全的決心，呼籲中南美洲國家支持西半球集體安全協定，特別是相互援助的「里約條約」。同時，美國與巴西簽訂了雙邊協定，使巴西成為維護南美洲安全的支柱，且在心理上消除了有些國家要修改「里約條約」的爭論。巴西正試圖領導磋商一項「南大西洋公約」。包括巴拿馬在內的中美洲六國，從一九七六年十月「六國軍事會議」以來，已在協調一旦古巴共黨入侵，所應採取的聯合行動。



值得注意的是當前中南美洲所存在的經濟整體化<sup>⑥</sup>、美洲國家的經濟關係、美國對中南美洲的貿易政策<sup>⑦</sup>、以及巴拿馬運河問題等<sup>⑧</sup>，仍具有高度的爆炸性，而國際共黨之推波助瀾，更使這些問題，潛伏著危機。尤其是蘇俄，在智利軍事政變以後，一方面頻頻向南美諸國展開經濟攻勢，以資分化，另一方面先後售予祕魯大量坦克與戰鬥轟炸機，企圖在祕魯建立新的革命基地。古巴揚威安哥拉之後，已加強對中南美洲的覬覦，也加深了國際共黨對中南美洲的威脅。不過，往往外來的衝擊，更可提高西半球集體防衛的警惕。而今只有美國決心維護西半球的安全，才能使中南美洲維持穩定。而美國如何解決美洲國家間在「經濟利益」方面的紛爭，減少中南美洲國家所存在的憤懣情緒，并推動中南美洲國家加入北美陣營，共同建立一個南大西洋的集體安全體系？無疑的，這將是美國新任總統卡特所面臨的重要課題。

註⑥ 一九七五年八月二日，廿五個中南美洲國家在巴拿馬召開「拉丁美洲經濟整體化」會議，雖然他們對於應否繼續保持與美國的經濟關係仍有歧見，但在超越當前「拉丁美洲自由貿易協會」、「安第斯經濟組織」、以及「中美洲共同市場」之範圍，在廣泛的原則上達成四項計劃：1. 以整個拉丁美洲的國民經濟發展和財政合作，通力開發本地區的天然資源。2. 推進拉丁美洲國家的石油聯營，並保證其價格。3. 針對國際經濟組織及國際財團，制定一個地區性的共同經濟政策。4. 鼓勵並支持創立屬於拉丁美洲地區的多國性企業。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八日，已有廿三個中南美洲與加勒比海國家簽署此一整體化的憲章，其中包括古巴在內。

註⑦ 進入一九六〇年代，因為美國未能採取步驟穩定中南美洲農產品在美國市場的價格，而使中南美洲國家的貿易蒙受嚴重損失。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美國福特總統簽署國會所通過的新貿易法案，撤銷對委內瑞拉、厄瓜多爾以及其他石油輸出國家組織會員國的最惠國待遇，而引起委、厄的不滿。其他如巴西、哥倫比亞、祕魯、墨西哥、哥斯達黎加以及巴拿馬，亦認為美國新貿易法案已使他們輸美物品數量受到威脅，而成爲爭論的焦點。

註⑧ 巴拿馬運河本是一個爭論了很久的問題。從一九六五至六七年，美國與巴拿馬從事談判，起初巴拿馬堅持要修改一九〇三年的運河條約，收回運河區主權；美國則要在尊重巴拿馬主權原則下，維護美國永久經營保衛運河，以及十哩寬的運河管轄區。所以雙方成見甚深，談判毫無進展。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巴拿馬國民軍司令托里拉斯(Omar Torrijos)發動政變，取得政權，一九七一年四月，雙方又恢復談判。未幾又告停頓。一九七三年三月，托里拉斯要求聯合國安理會討論巴拿馬運河問題，美國認爲只有經由雙方會商一項符合雙方需要的協議，始可解決此一問題，故對安理會要求美國立即簽訂一項有關運河的新約，表示不能接受，而使用了否決權。因之，激起拉丁美洲國家的反響，一致對美國譴責。隨後，巴拿馬恢復與古巴的外交關係，使美國更爲焦慮。一九七四年二月七日，美國國務卿季辛吉與巴國外長塔克(Juan Antonio Tack)簽署一項原則聲明，就達成的十點計劃，作爲未來談判的基礎，應允最後將運河區交還巴拿馬。但是此項原則，遭到美國國會的反對，並且成爲美國大選中爭論的主題。共和黨的雷根更聲言巴拿馬運河區每一寸土地都像阿拉斯加一樣，是美國的土地。招致巴拿馬的強烈反應，托里拉斯曾聲明，除非一九七七年能草擬一項新約，否則他將領導一項民族解放戰爭，以收回失土。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廿一日脫稿)